

# 忆大雪

华玉琳

今年冬天,大雪节气如约而至又悄然离去,竟没留下一片雪花。这是多年来的常态了——别说大雪时节,就连最冷的严冬也鲜见雪的踪影。即便偶尔飘落,也是稀稀落落,雪小得可怜,天数更是屈指可数。

我记忆中的冬天,全然是另一番景象,雪花纷飞、银装素裹,眼前的一切都被温柔地裹进了白色的襁褓。

儿时的冬天,雪是常客。每年,它都会如期而至,铺天盖地,把村庄、田野、屋顶都染成一片纯净的白,给田里的小麦盖上一层厚棉被,为来年的丰收埋下希望的伏笔。那时的雪,下得厚实,下得持久,仿佛要把整个冬天都凝固在冰晶里。孩子们在雪地里奔跑,堆雪人、打雪仗,欢笑声在冰冷的空气中荡开,飘满了整个冬日。春节时,雪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氛围,红灯笼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鲜艳,鞭炮声在雪地上炸开,溅起一片片晶莹的碎屑。

捉麻雀,是儿时冬日里最有趣的游戏之一。大雪过后,田野被厚厚的积雪覆盖,麻雀无处觅食,便成群结队地飞到农家院子里。我们早早地准备好筛子、木棍和细绳,在院子里撒上谷粒,然后躲在门后,屏息凝神,等待麻雀自投罗网。当麻雀小心翼翼地靠近,钻到筛子底下啄食时,

我们猛地拉动手中的细绳,筛子“砰”地落下,麻雀便被罩在了里面。那种兴奋和成就感,至今仍清晰地留在记忆里。

砸屋檐下的冰凌,则是另一番乐趣。寒冬里,屋檐下的水滴在低温中凝结成冰,形成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冰凌,长短不一,形状各异。我们拿着小石子,对着冰凌用力扔去,“啪”的一声,冰凌应声而断,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有时,冰凌太长太重,砸下来时发出“咚”的闷响,仿佛冬天的鼓点。我们一边笑着,一边争着去捡那些断落的冰凌,含在嘴里,凉丝丝的,带着一丝甜味,那是冬天独有的滋味。

1965年和1976年的雪尤其令人难忘,那两年的雪下得又大又猛,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在白色之中。1965年的冬天,雪从早到晚下个不停,屋顶上的积雪越来越厚,压得树枝都弯下了腰。清晨起床推开门,眼前一片白茫茫,连门前的路都辨不清了。大人们忙着扫雪,孩子们则在雪地里打滚,堆起一个个比人还高的雪人。1976年的冬天,雪来得格外早,大雪节气过后没几天,村庄就被裹进了白色的世界,远处的田野更是白茫茫一片。那段时间,学校停课,我们整天在雪地里玩耍,仿佛时间都停滞了。

那时的冬天,冷得彻骨,却也暖人心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盆旁,烤着红薯,喝着热茶,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,谈论着家长里短。火盆里的火苗跳跃着,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,暖意从心底漫开,驱散了周身的严寒。雪,虽然带来了寒冷,却也凝聚了亲情,让人们在严寒中找到了家的温暖。

如今,大雪节气已过,依旧不见一片雪花的踪影。冬天,也好像变得温和了许多,不再有那种刺骨的寒冷,也不再有大雪纷飞的壮丽景象。偶尔的雪,也只是匆匆而过,没有留下多少痕迹。儿时的记忆,却像一幅幅黑白照片,清晰而鲜活地留在脑海中。那些在雪地里奔跑的身影,那些捉麻雀、砸冰凌的欢笑,那些围坐在火盆旁的温馨,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。

雪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、一种文化的象征。在古人的诗词中,雪常常被用来表达孤独、纯洁或坚韧的情感;而在我们的生活中,雪则承载了太多童年的欢乐和家庭的温暖——它是冬天的灵魂,是童年的记忆,是家的温暖。如今,雪少了,冬天的味道似乎也淡了,但每当想起那些大雪纷飞的日子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。

大雪节气没有雪,我却怀念那些有雪的日子。

## 父亲趣事之跨界“神医”

程立群

我一直觉得,我父亲49岁之前在我们村里是近乎传奇般的存在。他虽有些懒散,却是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,给人希望的“灯”。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以跨界“神医”之名,温暖了十里八乡无数个清晨与深夜。

那时,我家旧木桌上永远堆着三摞书:一卷翻烂了边的《赤脚医生手册》,一本封皮模糊的《兽医常见病》,还有一本夹满各式叶片标本的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》。没错,我父亲——既是医人的大夫,又是治畜的郎中,还是救庄稼的“田博士”。每当有人急匆匆拍门喊他出诊,我总暗暗担心:他会不会哪天把药方开给了玉米,把农药用在了小孩身上?可奇怪的是,从来没人上门找事,只有源源不断的感谢。我常跟在他身后“行医”,说是帮忙,其实纯属凑热闹。

他医人,多半是头疼发热之类的小毛病,大病从不乱插手。记得一个深夜,后村有人砸门,说家里“半挠子”(小男孩)烧得直说胡话。父亲披衣提箱就走。我被吵醒后突然想起:注射器被我偷偷拿出来玩,还没放回药箱!母亲催我赶紧送去。我在黑夜里狂奔,终于追上他。那孩子满脸潮红,呼吸急促。父亲用听诊器仔细检查,又从药箱取出银针,烤火消毒,在孩子指尖放出几滴黑血。随后配了几片药,细细嘱咐服用方法。那家人千恩万谢,父亲只摆摆手:“夜里守着他,发了汗就好。”而我,却因为乱动注射器,回家后结结实实挨了顿打,哭到天明。这一幕,至今刻在我心里。

治牲口,其实是他最不愿接的活儿。可总有人嫌去兽医站麻烦,直接拉他去看猪看牛。父亲总是推辞:“我是医人的,不是治牲口的!”村民却理直气壮:“人都能看好,牲口还算个事?”我不知道他究竟治过多少家禽、家畜,只记得他每次给猪打完针,总是满身污泥、有时还带些抓痕,蹒跚跛行着回家。母亲难免埋怨几句,他从不还嘴,只默默坐在门槛上,点上一根烟。

对庄稼,他却格外郑重。谁家小麦得了赤霉病、玉米害了纹枯病、棉田起了棉铃虫,他总是第一时

间赶到。他说:“人病了一时慌,还有医院托底。庄稼病了,可是一年的事。”烈日下,他举着放大镜,一叶一叶地仔细查看病情。他爱钻研,自创的糖醋治棉铃虫法,甚至登上《中国棉花》杂志,引来全国百余封信件交流求教。那些年,我们村的庄稼总是长得最安稳。村里人都说,有他在,地也踏实。

49岁那年,父亲在一次例行点名时突然倒下,身体倚住门框,右手垂落,嘴角歪斜——是脑梗。这个他诊断过无数次的病,终于找上了他自己。

如今,父亲已74岁。病后的他变得沉默,说话前总先憨笑一阵,再接得缓慢。有时话到一半突然卡住,他就闭起眼睛,努力寻找那个失踪的词语。有一次,我在田埂上故意掐了一叶病稻递给他:“爸,你看这是得了什么病?”他的手指轻轻抚过叶片,眼神一亮:“纹枯病,该打井冈霉素!”

那一刻,他仿佛又成了那个横跨三界的“神医”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——父亲不是神,他只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味药,微微发苦,却疗愈了整个村庄艰难奔波的岁月。他的世界很小,小到只有村头村尾;却又很深,深到每一片叶、每一声啼哭、每一寸土地,都记得他。

现在,我只想带父亲回村里走走,看看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,见见那些还没走散的老朋友。父亲啊,请您慢一点老,给我一点时间,让我陪您把这条熟悉的路,再走一遍。



## 十年

李红姣

十年如长河奔流,回眸时却似指间流沙。倏然惊觉,我投身徐州交通事业已十载春秋。2015年岁末,而立之年的我接过使命,自此以路为纸,以责为墨,书写与交通脉络同频共振的篇章。

当会议通知淹没了故人的消息,当加班灯火替代了团聚筵席,岁月终将答案轻叩心门:父亲佝偻的脊背、母亲藏于皱纹的牵挂、爱人默默温热的茶盏、老友跨越山海的一句“别来无恙”,方是人间最坚实的锚点。昔日追逐的烈酒般炽热的爱,终沉淀为清茶般的相守;而那些晨昏琐碎中攒下的暖意,恰似檐下春雨,无声浸润生命的根系。

十年俯仰,“得”与“失”如阴阳相生:有人困于错失的机遇,却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淬出金石之志;有人卸下“功成名就”的桎梏,转身于羹汤烟火里寻得生命的丰盈。恰似《华为十年感悟》中的箴言——至暗时刻常蕴微光,而破局之钥,在于“以行动丈量迷茫,以反思照亮归途”。

职场十年,是“低头耕耘”的修行,亦是“抬头看路”的觉醒。曾将“忍让”视为生存法则,却在原则与妥协的拉锯中彻悟:真正的成熟,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的赤子之心。正如那位抛却政工光环、重返校园的同路人,以“十年空对公文笺”的喟叹,换得“破茧寻光”的新生——人生转折处,学习永远是那柄劈开迷雾的剑。

立于新十年的渡口,需怀“刀刀向内”的果敢,亦需养“静待花开”的襟怀。若樱花树下那位顿悟者的低语:万物皆有时序,何必效仿他木争春?且作深谷幽兰,在属于自己的节气里悄然吐芳。前路行囊,当有三物常伴:如竹般虚怀若谷的学习力、如松般孤直守拙的定力,以及将平凡日子淬炼成诗的匠心。

人生终究不是沙漏中的竞逐,而是心境前的凝视。十年可作赌局,亦可为禅堂——区别只在,你选择与时间角力,还是与之共舞。正如里尔克诗中的隐喻:“未来早已藏于此刻的褶皱。”当下每一声笃定的足音,皆是写给未来十年的伏笔。